



主编 / 王洛林

本土全球化:

当代中国西部的社会文化变迁

执行主编 / 黄 平

Globalization: Sociocultural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China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主编 / 王洛林

本土全球化： 当代中国西部的社会文化变迁

执行主编 / 黄 平

Glocalization: Sociocultural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China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土全球化：当代中国西部的社会文化变迁/王洛林
主编.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6

(全球化与中国)

ISBN 978-7-5096-1503-4

I. ①本… II. ①王… III. ①社会变迁—研究—西
北地区—现代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6469 号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010)51915602 邮编：100038

印刷：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贾晓建

责任编辑：徐 雪

责任印制：黄 铎

责任校对：陈 颖

720mm×1000mm/16

17 印张

323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书号：ISBN 978-7-5096-1503-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010)68022974 邮编：100836

总 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全球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发展势头，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世界各国（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国际经济、政治的格局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一员，一方面分享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冲击。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增强和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对全球化的进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如何认识全球化与全球化中的中国因素以及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代知识领域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经济学科片、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片和社会政法学科片（现在的经济学部、国际研究学部和社会政法学部）的部分专家学者于 2004 年中成立了“全球化与中国”课题组，计划用 5 年时间（2004 年中至 2009 年中）从多学科的角度对全球化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不仅研究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经济、社会、法律和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分析中国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并就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化进程、如何因应全球化挑战等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全球化与中国》系列丛书就是在上述课题研究成果基础上编纂完成的。

按照立项计划，课题将分为 3 个部分，10 个专题。

第一部分是综合研究，包括两个专题：一是全球化的理论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二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第二部分是经济问题研究，包括 4 个专题：一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三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四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三农”问题。

第三部分是社会、法律和文化问题研究，分别从社会、法律、文化角度分析全球化对中国城乡产生的影响及反应，也包括 4 个专题：一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健康和扶贫政策研究，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社会—文化变迁，三是全球化与中国法律，四是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

以上各专题都将对该领域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专题研究一：全球化理论与未来发展趋势。本专题侧重于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全球化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规律性的展望。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实质及主要内容是什么？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全球化的度量方法是什么？全球化的条件、基础、动力、载体是什么？全球化的现实后果是什么？对各国人民的福利会带来哪些影响？类似于气候变暖这样的“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也将是本专题的一项重要内容。

专题研究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本专题主要回答以下问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哪些变化？未来的变化趋势如何？特别是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结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结合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本专题就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化以及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做出进一步的研究。

专题研究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宏观经济。本专题将在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做出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着力回答以下问题：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及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哪些影响？怎样认识全球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内在机制以及中国经济与全球化的契合点？并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做出展望。

专题研究四：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外向经济的发展。本专题集中研究中国的外资引进、对外贸易及中国对外投资问题。全球化为中国的外向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促进了中国外向经济的快速发展，解剖其中的内在动力、内在机制就成为深入认识中国外向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本专题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外资引进和对外投资做出了全面细致的分析。

专题研究五：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改革。本专题的主要研究内容，一是对国内外有关金融全球化的理论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和简要评述；二是探讨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机理，综合考察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及中国因素对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三是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金融业的效率标准与改革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以市场化为导向的金融改革建议。

专题研究六：全球化下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似乎取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也为其发展提供了便宜的土地。在中国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全球化既给农村群体带来了利益，也造成了损失，甚至使一部分村民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针对这一问题，本专题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全球化对农村群体的有利之处是什么？不利之处又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本专题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提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农村发展

思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专题的主要研究内容：一是对现有发展思路下的全球化影响做出评估；二是明确农村群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三是探讨新的发展思路中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及个人在其中的责任与功能，使受到损害的目标群体的特殊需要能够优先予以保障；四是评估实现新的农村发展思路的成本及资金来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途径；最后，就这一新的发展思路对全球化的可能影响做出评价。

专题研究七：经济全球化中的农村健康扶贫政策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已经解决。即使按照目前中国明显偏低的贫困标准，中国也还有两千多万的农村贫困人口。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公共卫生几乎成了国内市场化 and 全球经济竞争的牺牲品。中国各级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远胜于对于健康领域的关注。而健康，还有教育，无疑是影响贫困人口脱贫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针对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调整国家的卫生政策和扶贫计划，通过投资于贫困人口的健康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并借此获得减少贫困的效果。本专题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以便为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下的农村健康扶贫行动提供政策建议：一是沿着贸易自由化—药品价格决定—贫困人口常用药物的可及性—劳动者健康状况—非农就业—家庭收入—家庭消费与投资这样一个线索，探讨经济全球化对农村贫困人口生产生活的影响；二是考察现行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在贫困群体享受医疗服务及维护其家庭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三是沿着农村工业化和农业市场化—环境污染—与环境相联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农户疾病负担—社区环境成本这一线索，探讨经济全球化对农村人口的健康、家计和社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四是考察现有的环境保护制度、疾病预防和控制制度、污染受害者法律保护制度对维护农村公共健康安全和社区环境安全的作用。

专题研究八：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律。全球化使中国的法律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影响正在从三个层面逐步展开：一是具体的法律制度措施层面；二是立法体制层面；三是法律观念与法律文化层面。本研究将主要围绕这三个层面就全球化对中国法律所产生的影响的表现特征、作用机制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进而提出符合我国需要的制度选择建议。

专题研究九：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社会—文化变迁。本专题研究的是中国后发地区（主要是西部地区）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文化变迁所做的策略选择与实践过程。主要研究内容：一是探讨后发地区在全球化过程中具有地方特色的尝试与实践，力图从中摸索出一条既能利用全球化机遇，又能激活本地社会文化资源的发展道路；二是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带有共性的问题，在经验层

面对地方的实践予以概括；三是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基层实践的意义及其政策含义。

专题研究十：经济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本专题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与价值观念的重新塑造；二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三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

上述各项研究成果均将集结成册，同时，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形成的专题研究报告及课题研究总报告也将汇集成册，一并陆续出版。

我们希望，《全球化与中国》系列丛书的出版，能够加深我们对全球化的了解，提高我们对中国发展与全球化关系的认识；我们也同样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增加世界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解。

“全球化与中国”课题研究和《全球化与中国》系列丛书的出版，自始至终都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财政支持，对此，我们深表感谢。我们希望，本系列丛书能够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又一历史见证。

最后，诚恳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不足与错误提出批评指正。

王洛林

2007年10月

前言

一、对全球化的理解

全球化近来几乎成了日常用语中最为流行的词语，但全球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却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在学术界，对全球化至少有三种理解：

(1) 全球化实际上古已有之，虽然形式不同。例如，古罗马帝国的军事扩张、十字军东征，一直到近代的资本主义，都是全球化的历史形态。换句话说，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军事的、政治的、宗教的和经济的全球化的不同类型。

(2) 全球化指近代（其象征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对外侵略和扩展，其社会制度层面的种种后果中，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民族国家作为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被确立。

(3) 全球化专门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经济—科技—信息—文化的跨国化过程，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跨国经济—金融—技术—商业—信息，如何不断跨越民族—国家疆界，从而形成某种与民族—国家体系不同的所谓社会科学还无法妥善处理的新现象、新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强调，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结果（Thurow, 2000）。这也就意味着，全球化在概念上和以前几百年来生产、贸易和资本的扩张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如果按照第三种理解，全球化就不但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美国化，或“冷战”结束后的“单极化”，甚至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或简单地等同于商品化的过程。是否可以说，所有的民族—国家形态，都受到了全球化的挑战？包括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如何适应它的问题？

本书所选取的全球化的概念接近第三种理解。我们将全球化定义为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生产要素（资本、人口、技术、信息等）跨国界的高速流动和横向扩展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

化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作为一种现象，不同于全球主义（Globalism），后者是把前者单一化（例如只强调全球化的经济面向）、意识形态化（例如只讲全球化的“好处”），而掩盖全球化过程可能带来的问题，例如跨国大资本和大资本集团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把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变得更边缘化。

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急速程度，世界越来越小，变化越来越大；另外一个特点，可以从与资本主义早期的比较中看到，现在不仅是在经济、贸易和军事的意义上一个或几个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向全世界扩张和殖民，而是在文化层面上越来越信息化、虚拟化乃至碎片化；在政治的层面上，“冷战”结束，使世界的游戏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越来越具有排他性。急速的分化不但发生在南北之间，也发生在任何一个社会内部，全球富贵阶层（Global rich）和地方贫困人口（Local poor）的矛盾成为新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

随着产品、技术、资本、信息等如此大规模和高速度的跨国化，也带来了新的时尚、风气、品位，新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不但与后发社会的部分群体（特别是其中比较不“接轨”的群体）可能发生冲突，而且也会与整个地区性文化（包括以民族国家形式为标识的文化，既包括“法国文化”、“英国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发生碰撞。即使是可口可乐、麦当劳这样的东西，一方面固然是源于美国，代表了美国式商业文化和快餐文化，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地球村”，它们已经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美国的“民族文化”，而更是代表了大的跨国资本——虽然其中许多的主体或总部仍在美国——的利益。在美国本土之外，也出现了与可口可乐、麦当劳利益相关的群体，其管理者和经营者，实际上站到了跨国资本代理人的位置，而不只是从前意义上的“买办”。

如何看待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挑战呢？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近代以来一直积极地在建设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从孙中山时候起，我们的语境一直是要把中国建设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平等一员，因此，要加入世界体系，要“与国际接轨”。新中国成立、建设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加入联合国、对外开放等，可以理解为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目标已经实现了，中国已经建成了一个有自己的主权、疆界的现代民族国家（虽然还没有完成祖国统一，部分疆界还没有最终划定）。现在，以国家的、民族的、全民的名义，还在继续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和政权建设（State Building），包括确立自己的认同（National Identity）、发展自己的经济（National Economy）、建设自己的国防（National Defense）、弘扬自己的文化（National Culture）并实施国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 和建立社会保障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体系等基本框架。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各国开始反思如何处理国与国的关系 (国际关系), 如何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并确保和平、避免战争, 这样才有了我们熟知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各个殖民地纷纷赶走殖民主义者并取得独立, 但是也都纷纷——具有讽刺意味地——仿效殖民主义者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

但是, “冷战”以后, 由于资本、技术、信息、文化 (以及今后的人口——劳动力本身) 的大规模和高速度的跨国流动, 民族国家本身作为一种体系实际上已经不只是从前意义上的了。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 它们都遭遇到了来自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而不只是来自其他民族国家特别是所谓“列强”的挑战。所以, 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需要研究的就不是简单的中国的商品跟美国或印度的商品竞争的现象, 也不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如何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的竞争, 而是要研究中国如何应对来自跨国公司和跨国经济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开始了市场化的道路, 经济逐渐融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吸收的外国投资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更是如此。而有意思的是, 与其他大多数国家 (既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 相比, 在中国, 无论是专业技术人员还是普通百姓对全球化的态度都要积极和乐观得多。这也许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持续快速增长的缘故。如果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上是得益于全球化的,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和评估全球化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的影响?

全球化并不能自动地带给所有人以平等的机会和结果。怎样保证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们都能够得到全球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机会是全球化最大的挑战。没有相关的制度安排, 人们就会感到前途未卜, 甚至彼此敌视。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世界各地都兴起了保守的或者激进的民族主义, 而各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甚至极端恐怖主义也在抬头。在中国, 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社会不平等在加剧,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在拉大, 暴力犯罪在增多, 普通民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生计更加脆弱和不确定, 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全球化能够给所有中国人带来更公平的机会吗? 我们应从怎样一种角度去看待全球化, 应该设计出怎样的制度来保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多数人能够受益, 尤其是所谓“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 从分地区的角度来看, 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凭着区位优势 and 先发优势成为全球化在中国的“桥头堡”。至少在经济上, 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刺激了东部地区的发展和

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中部和西部地区呢？特别是西部，在缺少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的情况下，如何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中去呢？

二、全球化与中国西部的发展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中国的广大西部地区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文化上也越来越受到全球事件的影响。本书所调研的云南迪庆藏区，其盛产的松茸远销日本等地，其打造的“香格里拉”品牌就借助了1933年美国著名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的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的重要影响力。

毋庸讳言，中国目前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类似“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一方面，我们今天的上海、广州、深圳乃至东南沿海的许多城市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和港澳台地区的经济，韩国、日本的经济，乃至和东京、汉城、马尼拉、曼谷等几个大城市之间的文化，从这个层面上形成了一个区域性趋同现象。现在的年轻人，北京的、上海的、东京的、曼谷的、马尼拉的，等等，在风尚、兴趣乃至价值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区域现象也不是简单的西方化，它们有一套自己文化上的认同和边界。另一方面，中国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不协调、不平衡的关系。广大西部地区在发展的道路上遭遇了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村庄普遍卷入全球化的生产—流通—交换格局，但带来的结果（分配和消费等）却不尽相同。这不仅与全球化本身有关，也与各地的资源占有、分布和占有、使用的规则有关。正是在各地不同的资源条件下，它们发展了自身参与全球化的不同方式：沿海等地由于水土资源有限，主动发展工商业进入全球化的工业生产链中，社区则面临城市化的压力；而中部广大地区由于人均资源有限以及承受更重的赋税压力，因此出现了长达十余年的“三农”危机，乡村社区一直面临衰落的压力。西部地区乡村社区的变化一般总是被归入中部地区的一般特征。另外，西部也被标签化了。对于西部更为广袤的乡村地区来说，由于地处山区或者高寒地理区域、边远偏僻地带，同时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因此也被定性为“老、少、边、穷”地区，是中国扶贫事业的重要分布地带。以上两大普遍看法均没有更深入细致地看待西部地区的乡村社区，至少没有从现实社会发展的角度将西部地区纳入全球化分野中的地方社会这样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如果说“三农”问题的讨论还涉及现实社会发展的压力，多少带有社会一体化考察的动力，那么，地理区位、民族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上的差别对待则有遮蔽地方社区与社会自主地参与全球化并从自

身条件出发进行社会整合、改造全球化甚至发展本土全球化的可能性。除了基本国策的长期制度化特征外，我们遗憾地发现，众多学术研究缺乏现实视角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研究一直没有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分科本位中走出来，在具体考察当地社会的过程中缺乏对当地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的现实状态的仔细区别和分析，而对将早期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同现实社会的发展做贯通理解的研究也多少带有偏差，往往是以过去的论题来切入当今的社会。我们需要将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大量有机地充实到历史、民族与人类学的考察中，才能正确地理解近二三十年来西部地区乡村社区所发生的结构的和文化的变迁。

在一定程度上说，相比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西部地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更加巨大。别的不说，它的县、乡两级财政常年处于短缺乃至亏空的状态，农民除了出去打工，好像就没有在本地发展的希望，这在微观层面上已经是很困难了。但是，假如我们不是都在家庭、个体的层面上想问题，而是把这一块地方至少当成一个整体的、区域的格局，从资源到资金技术，一直到人，市场和人的社会组织生活的那样一种格局，这也有可能形成西部的优势、西部的特色、西部的经验、西部的实践，哪怕这个实践经验似乎没有什么推广意义，拿不到国家层面做榜样，这个时间或许也就5年或10年，10年后它又被一种新的实践取代了。这些年来，我们经常讲全球化和市场化，很少讲地方化和区域化，虽然也提中国特色，但实际上没讲地方特色，讲不讲本来倒也无所谓，关键是很多潜在的优势和可能性没有被注意到。我们老是在讲规范化、标准化，从WTO规则到与世界接轨，但是许多潜在的可能性反而就可能因此看不见了。

从整体上看，中、西部很多地方都缺两个资源。一个是自然资源短缺，像西北缺淡水，西南缺耕地、木材那样可利用的资源；另一个是财政资源短缺，整个中西部县、乡两级财政很多年基本上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在这两个资源都缺乏的情况下，如果简单用人均GDP、人均收入，或者仅仅在上述技术指标的层面去想，这些地方基本上像某些人说的“不适合人类生存”了。

但是，有一种公共资源似乎没怎么受到应有的注意，那就是公共的社会资源。它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在过去20多年中甚至被有意无意地肢解了、打散了。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包括所谓的“老、少、边、穷”地区，也包括北京附近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都还存在着多少年、多少代积攒下来的一套又一套的规范、道德、价值、秩序，以及在这套规范道德价值秩序背后磨合出来的一套又一套的行为方式和组织模式。一旦我们把公共的社会资源（包括价值和制度）纳入我们的视野，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西部很多人比我们想象得要富有得多，也比我们自己要充实得多、有文化得多，他们有思想、有智慧、有情趣、有喜怒哀乐，甚至还有艺术，至少生活与艺术还没有完全分家。如果

我们能够意识到并把这些公共的社会资源重新组织起来、激活起来、勾连起来，变成发展当中的有机的部分，那么自然资源的短缺和财政资源的短缺，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被缓解。不适宜居住，从自然意义上缺水、缺地，也都可以得到缓解。同样，我们以为没钱办不成的事，人家红白喜事照样办，不仅照办还能办得那么热闹，那么有滋有味，又扭秧歌，又吹唢呐，这是为什么？这是他们在利用这些有形无形的公共社会资源。很大程度上，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短缺，能够被这些社会资源所弥补。

更重要的是，人不仅是自然动物和经济动物，公共的社会资源不但弥补了自然资源和财政资源的短缺，在更大程度上其实是它们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它们使社会能够被延续，生活能够再组织，社会能够再生产，甚至被再阐释的基础。因此，对于中、西部来讲，要谈科学发展，不是要简单地学苏南和长江三角洲，更不是学大上海，追大北京，而是要把每一个地方独特的、自然的、生态的、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特色重新激活起来、组织起来，从而形成区域优势，摸索出一个比较适合的发展格局和发展道路。

正因为如此，本研究作为“全球化与中国”项目中的一部分，不是简单地从经济角度来谈全球化对中国西部的影响，而是重点关注我国后发地区（主要是西部地区）在全球化挑战中在社会—文化上选择怎样的策略与实践，并试图分析地方政府、地方的社会组织、当地居民、流动人口等各种因素对后发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新的发展理念在地方层面的贯彻实施将如何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当地居民是如何重新利用或整合地方社区的传统资源（制度、习俗）的。

三、香格里拉：全球化的社会—文化内涵

全球化在经济层面的影响很明显。“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融合、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全球化不平衡的情况也日益增多：第一，经济区域与地区差异扩展，如全球南北经济鸿沟、地区贸易争端，即使在一国内部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区域差异而呈现的不平衡格局也越来越明显；第二，经济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经济全球化导致劳动力市场、原材料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日益脱离社区和社会层面，给社会协调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扰；第三，经济全球化也影响到政府政策和区域发展规划，导致政策和规划面对社会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关注不够，对经济发展资源配置的优先战略加剧了社会和文化的空心化或边缘化，给全面协调发展增加了新的难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

由此而带来的世界一体化的认识过于简单,综合考察后发现这些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乐观论断很少考虑社区整体和社区的整体变迁。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各国众多社区的整体演变过程并非现代化的单一叙事,而是具有多样性发展内容的社会空间的自我更新历程。而非西方社会的社区从来也不是被西方现代性整合或被边缘化的单一社会,它们同样是具有多样性发展可能的各种具体社会空间。这给全球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认知可能,有利于完善或修正对于全球化的全面认识,也有利于人们立足本土利用经济全球化而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来说,全面协调发展就是避免单一的、片面的发展(例如只追求统计上的GDP增长),而强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综合协调发展。而有机地整合这些载体的只有在地社区。因此,协调发展最终还是全球化开放体系下在地社区的全面协调发展。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本土全球化既是世界一体化理论和实践的反思的结果,也是从新的角度推动全球化向更合理方向发展的开端,在这个过程中,在更具整体性的社会—文化视角下与经济全球化互动所产生的地方全面协调发展经验尤其值得关注。

西部就是这样一个整体性很强的全球化“原乡”,早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人就在这里寻找全球化的理想典型,那时并没有经济全球化的单一视角,而是全球化的整体观的典型反映。人们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候寻找人间天堂,把当时中国西部的现实社区想象成全球化的原乡,就是这个原乡激励人们重新认识全球化的整体性及其现实发展情况。

人们从外面来到香格里拉,第一印象是她的富饶、美丽、平和、宁静,这是一个自然生态保存完好、社会人际关系融洽、财货充裕、分配合理的理想社会典型。它蕴涵着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所有元素,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即使在当今全球化出现众多不平衡发展格局的时候,香格里拉也无愧于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普遍性追求。当人们费力寻找现世的理想社会的时候,当人们局限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平衡发展中矫正全球化的弊端的时候,香格里拉无疑是整体的全球化社会的样板。它超越了西方和东方,也超越了发达和落后等众多的二元分析视角,但它也长期没有被人们认真对待并看成实践的社会整体观的实现。

在香格里拉这个全球化的原乡面前,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知识体系在简单地对峙着。一个是“消失的地平线”,只存在于过去,是失落的文明,这导致对中国西部的看法一直只存在于过去的历史甚至想象的历史中。这缺乏对全球化的社会文化的现实关注。另一个是现实的区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下的欠发达地区定位。这明显缺乏全球化的社会文化关怀。

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历史和现实来看,社会—文化视角的缺失影响了对

全球化的全面认识。即使有香格里拉这种全球化的原乡存在于世间，也很难促使人们对全球化做综合考察。不消除覆盖在香格里拉身上的这些片面的认识，也难以同全球化的知识体系形成对接。

失落的文明，不管是社会历史形成的还是现实的地缘政治、区位优势经济发展观下形成的，对文明的认识反映了全球化的现实困境和历史问题。古往今来的全球化，多数还是区域化，例如古代和近代早期的地中海世界、东亚文明、近代的北大西洋体系乃至当代的西方体系。但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的目的论倾向浓厚，欧洲中心论扩大为西方中心论主宰了全球化的叙述体系，而且主题从单一的经济现代化铺展到政治、法律和文化价值观上。这种片面的认识掩盖了全球化的区域文明本质，导致今日全球化的经济一体化泛滥。文明或者文化在19世纪以来的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德国学者讨论文化的时候，偏重于非物质因素，区别于法国学者讨论文明的整体性，不过两者逐渐合流，中间完成过渡的是生产方式被整体纳入文化和文明的分析框架中。文化和文明分析的整体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上涵盖了物质生产、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精神活动在内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完整序列，这就是后来文化与社会通用的原因。在社会人类学中最初的社会分析单元都是文化，直到新文化史兴起，文化去物质生产活动的趋势才比较明显，但物质文化或文明仍然在文化分析的视野中。二是从最初的本土文化或文明研究拓展到各个文明的比较与整合上。

即使从人类学对于文化的定义上来看，涵盖面仍然包括从生活方式到精神活动、价值体系的一个完整体系。所以全球化有一个社会—文化通观的知识积累存在。今天对全球化的分析和对香格里拉的定位显示了整体观到单一或者学科认识的巨大缺失。这反映了这个时代知识体系的简单化特点。当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确实缺乏较深厚的积累，无论是形式上的规范化还是内容上的专业化，仍然缺乏一个应对现实具体问题的整体知识体系，多数现实社会问题均非目前狭隘的学科视野可以涵盖的。今天民族的、生态的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将西部偏远社区处理成一个个孤立、封闭、遥远村落的民族志的时候，或者以“老、少、边、穷”来定位西部的时候，社会文化现实发展的状况反而被遮蔽了。

在西部地区处于现实发展的情况下，需要回到全球化的社会文化或文明的整体分析视角中，对西部全球化过程中地方社区与全球化的互动做一个专门的考察。即使按照民族学、人类学或者生态环境史学对西部社区发展进行考察，那种缺乏生产活动或者市场经济活动的分析是难以理解传统社区的长时期变迁的，因为这些在地社区在全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其来有自，而且也决定社区未来变迁的方向，这些新问题很难被排除在狭义的文化范畴之外视而不见。即使有地理、民族文化甚至宗教问题存在，在经济全球

化发展过程中，阶层、职业和经济差别的存在也反映了传统单一分析思路的捉襟见肘，民族国家越来越需要在社会文化整合上统筹民族、宗教和区域问题。在对西部进行社会文化分析时，需要将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有机地充实到历史、民族和人类学的考察中，丰富社会文化的内容，正确理解近二三十年来西部地区乡村社区所发生的结构性的变迁，将是对西部地区社会协调发展经验的透彻考察。

20 世纪早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提出了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禀赋与人口发展之间的冲突，尽管“人多地少”是一个简化的表述，但学界的研究，无论是社会史研究还是现实梳理，乃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三农”问题的提出，都佐证了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历史形成因素。中国的资源禀赋和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现代经济核算体系面前，其窳败情形一目了然，但是中国如何发展却并非那么清晰。从我们最初对中国外出务工人员生命活动历程进行的考察到对农民工反贫困的综合研究，农业生产自身的客观条件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异也促使乡村农业过剩人口大规模外出流动。这导致乡村社区和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内部协调发展的难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城镇化遇到了很多体制性的阻力，更多的是空间和经济城镇化，还没有实现社会和文化的整合。而且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镇化的壁垒一直在加高，体制性的约束并没有有效消除，市场的成本却在加大。流动务工人员的社会服务项目，包括法律权益、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和工伤医疗等虽然被逐步克服，但城乡分立的二元体制和经济波动仍然对新移民融入城镇形成了长期的制约。全球化所导致的经济过剩、通货膨胀与中国未来总体就业不足的威胁并存，对农村社区、外出务工的农民和努力在城镇落脚并发展的移民来说，需要社会文化领域的整体变革才能让危机转变为生机。

总之，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紧张的国情和今日中国所处的全球格局，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而只能通过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社区的全面发展来消解城乡差距。例如在农村，我们的研究显示农村防疫、医疗系统存在的困难影响了农民增收、生活改善，农村教育从村往乡再往县城集中的变革也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生活负担，他们为了子女的教育也需要“带着镣铐跳舞”——一方面是收入增加的艰难，另一方面还得有家人消费型陪读。这些社会文化方面的公共服务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乡村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总体改善。我们在西部调查中所获得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公共资源有助于社区可持续发展。通过公共性的寻回，包括公共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社区才能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做到优势互补、因地制宜，总体提升自身生活水平并改善社区环境。中国西部作为香格里拉的原乡，在最近二三十年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很多坚持社会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案例，有的甚至整体上具有探索

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多年经验积累，但我们在全球化的单一思维模式下是看不到的。这些与全球化互动形成的经验有助于中国站在全球化发展的前沿调整内部各地区不平衡发展的格局，形成新的协调发展的社会模式，届时，香格里拉的社会文化涵义将得到坐实，新的全球化的社会图景将得以形成。

四、新的全球化图景：当代中国西部社会的整体发展

全球化与西部社会文化发展的课题立项以来，我们对相关的研究和当代中国西部乡村的社会发展实践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反思和调研，一部分成果汇总为《西部经验——对西部农村的调查与思索》、《误导与发展》、《农民工反贫困：城市问题与政策导向》和《公共性的重建》。^①

本书集中探讨了全球化与当代中国西部乡村社区的社会文化实践。几年来，我们集中对西部藏族聚居村落和纳西族聚居村落进行社会调查，也包括对藏区的整体社会调查，内容包括生产生活方式、劳动力流动、教育、旅游和外来援助项目等。香格里拉不仅是现代全球化人间天堂形象的发源地，更是现实在地社区人们建设人间天堂的原乡。我们不仅要反思香格里拉作为全球化原乡的文化建构及其现实反应，更要在实际社会历史面前呈现香格里拉作为全球化原乡的本真涵义。

从整体上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虽然西方对西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藏传佛教在西方得到广泛的传播，西方人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相比以前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但由于西方人在语言和信息上存在不足，以及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偏见，还处于对香格里拉的想象的历史认知阶段。

第一章考察了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和发现的演变过程：在17世纪西方传教士初次踏足西藏时，他们虽然带着基督教的眼睛试图发现藏传佛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相似性，但大多比较尊重，甚至崇拜这种宗教。而在18~19世纪，西方人对西藏以及藏传佛教则大多倾向于持一种排斥和蔑视的态度，认为藏传佛教中有许多神秘主义和迷信的色彩，藏族社会还处于野蛮阶段，藏传佛教则是野蛮环境中的喇嘛教。然而，自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以来，神化、美化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倾向开始出现并日渐加强。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对西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遭受现代性苦难的西方，日益把这个依然保持地理上和文化上神秘色彩的西藏视为人间的“最后一块净土”，并幻

^① 以上除《误导与发展》为黄平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外，均由黄平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